吴方言昆山方言点、苏州方言点和上海方言点的音类对比研究

殷　骁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国际合作部，北京 100863）

摘要：苏州、昆山、上海地理紧邻，方言高度相似。长期以来苏州、上海两地方言研究较多，而昆山方言研究较少。昆山地处苏南地区，其方言的语音特征综合了苏州、上海两地的特征。本文以中古音系为框架，对三地方言进行音类对比，初步探究昆山方言的性质和历史音变规律。

关键词：昆山方言；苏州方言；上海方言；吴方言

苏州和上海地区方言土语是传统吴方言研究的重点对象。由于位置靠近，通话几乎无障碍，互相影响程度较高，苏州和上海方言[1]常常被用来进行对比，以求探究吴方言尤其是北部吴方言发展规律。处在苏州和上海之间的昆山市所用的方言也是一种典型的北部吴方言，其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江苏省昆山市西接苏州，东临上海嘉定，北部为太仓、常熟、无锡，南面是上海青浦、闵行、松江和浙江嘉善。从语音特征和移民历史来看，昆山方言受苏州、上海方言的影响很深；从很多人的听感来判断，昆山方言就是一种带苏州音调的上海方言，或者苏州和上海方言的过渡体。这种认识当然是片面的。本文对苏、昆、沪三地的音类进行初步对比，并尝试得出一些昆山音系性质和历史演变进程的简单结论。

一、现代苏、昆、沪三地音系的说明

苏州方言音系参考汪平(2011)，上海方言音系参考钱乃荣（1992）及顾钦(2007)，昆山方言音系参考吴林娟(2006)及笔者本人口语；都以市区中派语音为准，必要时列出老派、新派语音。另外，尽量兼顾文白读，极个别非常规读音或者很少见的文读，遇到时会说明。由于各人记音习惯不同，同一语音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国际音标字母符号，本文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写，力求统一，具体改动在文中说明。

二、中古音系框架下音类的对比

在中古汉语语音框架下，比较苏、昆、沪三地音系的音类（声母、韵母、声调），重点探究昆山方言的音类。放在中古汉语语音框架下是因为便于阐明历史音变轨迹；比较音类是因为音类是语音历史层次的基本单位。陈忠敏(2013)指出，语音历史层次，包括文、白异读形成的历史层次，其基本单位既不是音节也不是音位、音素，而是音类。

苏、昆、沪三地的文读高度相似，且都受官话（普通话）影响较大。对于某些不分文白读的韵，譬如虞韵，陈忠敏(2013)认为都是文读，本文认为比较韵母时区分文、白读没有很大意义，可以认为都是白读，也可以认为都是文读，在对比时列出所有韵母即可。

（一）声类比较

对照中古声母，三地主要有以下差异。

1. 精组颚化

按照中古汉语声母的框架，苏、昆、沪三地方言的声母差异非常小，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相同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精组三、四等字颚化，苏、昆、沪三地的程度不同。舌尖前音的塞音、塞擦音后接前、尖元音时容易读成舌面前音，在各种语言中都是普遍现象。具体到吴方言，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尖音团化”。

就北部吴方言来说，苏南地区“团化”程度较小，上海程度较大，浙江的更大。其中苏州、昆山和上海都处在“团化”过程中，苏、昆非常一致，“团化”的字音很少，很多字音可以保持“尖音”不变；上海更倾向于音变为“团音”。

以下面一组字音的声母为例：

---

[1] 按照方言学规范术语，应该称为“苏州方言点”、“上海方言点”，“昆山方言点”，为了更符合日常叙述，下文将它们称为“苏州方言”、“上海方言”，“昆山方言”。

地区/例字	酒	千	墙	相	祥
江阴	ts	tsʰ	dz	s	z
无锡	ts	tsʰ	z	s	z
常熟	ts	tsʰ	dz	s	dz
苏州	ts	tsʰ	z	s	z
昆山	ts	tsʰ	z	s	z
上海	tɕ	tɕʰ	ʑ	ɕ	ʑ
宜兴	tɕ	tɕʰ	ʑ	ɕ	ʑ
绍兴	tɕ	tɕʰ	dʑ	ɕ	dʑ
宁波	tɕ	tɕʰ	ʑ	ɕ	ʑ

单以精组三、四等字音中声母颚化而言，苏、昆、沪的音变轨迹都很明确，上海方言“团化”的字音更多，说明语音演变比苏、昆都要更“新”。需要说明的是，北部吴方言的颚化，自北向南的方向上和音变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无法具体判断是自身音变还是借自权威方言形成文读。沈钟伟（2007）认为上海见系二等字音 k->tɕ-属于借入形成的文读音。在此想讨论的主要是苏、昆、沪三地音类差异，因此不详细探究是自身音变还是异源成份。

以昆山方言而论，可以观察到处在“尖音”向“团音”过渡过程中。部分字的读音，大多数昆山人发“尖音”，而少数人发“团音”，并且前者以中老年人为主，后者以青年人为主；部分字的读音，同一个人大多数时候发“尖音”，少数情况会发“团音”。譬如“焦”字，中老年人大多读[tsio]，大量青年人读[tɕio]，也有不少人混读。

2. 其他颚化

苏、沪、昆三地见系声母及晓母细音相比中古汉语音系都有颚化，比较一致但稍有区别；总体来说，上海颚化程度非常高，苏、昆处在颚化进程中。上文已经提过，沈钟伟（2007）认为是白读向文读的转变。譬如溪母的“去”字，苏、昆两地都有[kʰ]-/[tɕʰ]-两读。在句子中的动词，譬如“我去”，昆山市区很多人可以有时候说“我[kʰe]”，有时候说“我[tɕʰij]”，分布情况没有规律。

另外，上海方言中存在一个少见的声母[ʑ]，譬如“序”、“席”和“谢谢”中第二个“谢”字。在松江、整个苏南都没有这个声母，相应的字音声母在苏、昆两地都是[z]。游汝杰(2006)认为受宁波话影响而增生，出现在中古邪母字中。这是上海方言受外部影响比较多的证据。

3. 晓母洪音字音变

声母上的第三个差异不是很明显，但是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按照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音变规律，晓母洪音字音声母保持为[h]，细音字音变为[ɕ]，苏、昆两地完全符合此规律，上海方言却出现晓母一等合口字声母为[f]的情况，譬如“虎”[fu]和“灰”[fe]。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部分晓母一等合口字的声母在上海人群中是两读的，既有[h]，也有[f]，说明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音变过程之中。这种情况在昆山东部的花桥同样存在，花桥本地上世纪 20-30 年代出生的居民口语即有两读的情况。

如果[h]、[f]并存那么哪个是后起的呢？很多语言的历史音变提供了参照。譬如日语，ハ行假名历史上经历了声母*p＞*f＞*h 的音变，证明[f]先于[h]，上海老年人保留[f]更多也是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除晓母一等合口字以外，上海方言也存在喻匣母字与非组字合流的情况，究其原因，[ʔu]、[ɦu]和[ɸ]、[β]、[v]很相似[2]，“胡”、“王”声母读成[v]也不算错。苏、昆互相一致，即便是新派语音也没有合流的情况，说明语音上还是比较“旧”。

4. 声类的“新旧”

以声母论，苏、昆两地音系比上海更“旧”一些，最大的区别就是“尖音团化”，包括见系颚化，[h]、[f]相混，[ɦ]、[v]相混，借用外部[ʑ]等等也是佐证；而苏、昆两地互相高度一致。苏、昆是一类，上海可以看成是一种“新派”。前文已经提到，这些声母的差异可能源自身滞后音变，也有可能是假借权威方言形成的文白差异，不同例子需要各自具体分析。

另外，三地声母音变都越来越受到普通话影响。譬如口语中很少出现的“骁”字，其声母三地

[2] 游汝杰（2016）记录[ɸ]、[β]和[f]、[v]互为变体。于后元音拼读的是前一组，与前元音拼读的是后一组。譬如上海南汇话：火ɸu⁴⁴，划βʌʔ¹²；飞 fi⁵³，滑 væʔ¹²。

老派读作[tɕ]，而中派以下大部分人不会读，即使读也发音为[ɕ]，不符合任何音变规律，仅仅是单纯的借用普通话声母而已。

（二）韵类比较

1. 中古音各摄所辖韵母比较

通摄

三地通摄各韵的韵母高度一致。舒声一等韵韵母均为[on][3]，入声为[oʔ][4]；三等韵为[ioŋ]。入声韵韵母为[ioʔ]。昆山存在[yəʔ]和[ioʔ]合并的趋势，譬如烛韵的“玉”、“局”在中年人中韵母已经不分，倾向于[yəʔ]。这种合并应该是受北方官话（普通话）影响而产生的，苏、沪两地也存在。

江摄

昆山方言江摄各韵舒声韵韵母为[an]、[on]，入声的为[oʔ]；苏州、上海和昆山的区别是改[an][5]为[ɑn]。传统上，苏、沪[a]、[ɑ][6]对立，但是都趋向于合并；昆山已经合并，在这一点上，昆山的语音演变“新”一些。从中古音来看，江摄的主元音拟为*ɔ，[a]、[ɑ]、[o]都是*ɔ音变而来，[a]、[ɑ]是低化的结果，[o]是高化的结果，也可以认为是音位变体；中古音二等介音拟为*ɣ，在汉语方言中，部分二等字介音脱落，部分二等字介音音变为[i]，苏、昆、沪三地分为两组正好反映了正常的中古音到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化情况，也说明昆山方言“新”一些。

止摄

昆山止摄开口三等各韵韵母比较复杂，有[a][7]、[ij][8]、[e]、[ʅ]、[ɥ]。

合口三等为[e]、[ue]、[ɥ]、[ij]。昆山的[ɥ]都出现在开口韵知章组字和合口韵知章组、日母字，是[ʅ]的变体。

苏州方言和上述昆山方言一致。上海和苏、昆都比较相似，只不过没有[ij]，而是[i]；也没有[ɥ]，全是[ʅ]。有的人认为[ue]、[e][9]在苏州方言中应为[uᴇ]、[ᴇ]，只是记音习惯不同，本文不作区分。

苏、昆、沪三地止摄各韵韵母应该存在不同层次，但是互相之间对应严整，不用划分层次也不影响互相对比。三地的止摄韵母在音位上高度一致，语音不同属于音位变体。譬如，苏、昆、沪都是[e]；苏、昆的[ij]，上海是[i]；苏、昆有[ɥ]，而上海没有，只有[ʅ]（*ɥ＞[ʅ]的音变）。

根据钱乃荣（2014:67）记录，上海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还存在[ij]、[i]，[ʅ]、[ɥ]对立，到 60 年代已经合并为[ʅ]、[i]。由此判断，上海止摄部分韵母处在比苏、昆更超前的音变进程中；结合地理位置，昆山止摄韵母像是苏州和上海的过渡形式。

遇摄

三地对应非常齐整。苏州、昆山相同，合口一等模韵字韵母都是[ʊ]、[u]、[əʊ][10]；三等是[y]、[əʊ]、[ɥ]、[u]。

---

3 苏、昆、沪三地的阳声韵中，通常前、高元音后配-[n]尾，后、低元音后配-[ŋ]尾，两尾不形成对立音位，本文一律写作-[n]。

4 上海方言“凹”和“丫”的元音，钱乃荣（1992）记为[ɔ]、[o]；汪平（2011）也是相同记法。[ɔ]、[o]的入声，据游汝杰（2016：66）记录，上海市区绝大多数人不分[oʔ]、[ɔʔ]，都读[oʔ]。当代北部吴方言元音普遍高化，昆山、上海的“凹”的元音，本文记为[o]，“丫”的元音记为[ʊ]。这只是记法不同，不代表有音位差异。

5 苏、昆、沪三地出现的鼻韵[an]，部分学者认为实际音值为鼻化的[ã]，但是和[an]不形成对立音位，本文统一写作[an]；[ɑn]也是类似的。譬如汪平（2011）就认为苏州的鼻韵[an]、[ɑn]实际上都是鼻化元音韵母。

6 苏州、上海市区都分[a]、[ɑ]，但是部分人觉得苏州[ɑ]音值稍有不同，应当是[ɒ]，游汝杰（2016：70）记录的苏州话元辅音表就只有[ɒ]，没有[ɑ]；汪平（2011）只有[ɑ]，没有[ɒ]。大部分人不觉得有区别，本文不作区分，统一记为[ɑ]。

7 三地出现的元音[a]，如果作单元音韵母时，有的材料记作[ʌ]，前无介音，后接喉塞组成韵母时记作[ʌʔ]；在[i]、[n]之前或鼻化元音时才记作[a]。这种表现和北京话中的/a/音位一致。本文不作区分，统一记为[a]。

8 本文将“衣”韵、“烟”韵韵母记为[ij]、[i]。

9 本文以[ɛ]、[e]表示昆山的“海”、“灰”的主元音。

10 有的人认为苏州[əʊ]稍有不同，应当是[ɜʊ]，只是记音习惯不同，本文不作区分。

上海也非常相似，只是上海没有裂化，只有[ʊ]、[u]，没有[əʊ]。

北吴遇摄各韵韵母层次不同，鱼韵、虞韵至少就有相混和不相混的层次区别。三地对应齐整，因此可以不分层次，简单对比音类看出差异。[əʊ]是[u]裂化结果，主要来自合口一等和庄组三等字；[y]、[ʮ]、[ʅ]应该是音位变体（虽然本地人听感上有差别），陈忠敏（2013）指出北吴音变*iu＞*y＞*ʮ(ʯ)＞[ʅ]。

就[y]、[ʮ]、[ʅ]而言，上海比苏州、昆山两地都要"新"，即音变进程更快；就[ʊ]、[u]、[əʊ]而言，苏、昆存在裂化，比上海"新"。也有人认为裂化并非自身音变，而是借入外部权威方言的结果，无论如何，苏、昆更"新"一些。据笔者猜测，裂化为自身音变的可能性较大。譬如昆山"乌"、"邬"字，既有人读[ʔəʊ]的，也有人读[ʔu]的。北吴借入权威方言音多为官话（普通话）音，如果为借入结果，应当是[u]早于[əʊ]，而不是相反。

另外，遇摄还有独自成音节的鼻音，譬如"鱼"[ŋ]，三地高度一致，不作赘述。

蟹摄

蟹摄各韵韵母相比其他摄较为复杂，但是苏、昆、沪三地之间却高度一致。

昆山蟹摄舒声开口韵字音韵母是一、二等[e]，[a]/[e]，[ia][11]；三、四等[ij]，[ʅ]（部分字如泰韵字中[e]是文读，[a]是白读）。

舒声合口韵字的韵母是一、二等[e]，[ue]，（见系）[ua]、[ʊ]/[ue]、[ua]；三、四等[ij]，[e]，（见系）[y]/[ue]。

苏州和昆山的一致。上海的也高度一致，只是上海没有[ij]，都失去摩擦变成了[i]。

某些字的韵母，譬如泰韵"最"，三地人群中都有有[e]、[ø][12]两读，应该是受官话（普通话）影响；还有部分去声字譬如"迈"[aʔ]促化，属于非常规音变，三地一致。

以蟹摄各韵韵母而言，虽然内部存在多个层次，但是三地互相之间一致，仅仅是上海*[ij]＞[i]表现出比较"新"，可以忽略不计。

臻摄

昆山臻摄舒声开口各韵韵母一、二等[ən]；三、四等[in]，不过庄组、知章组保持[ən]，日母[in]/[ən]。

舒声合口各韵韵母一等见系为[uən]，其他[ən]；三、四等见系[yn]，日母[yn]/[ən]。

入声开口三、四等为[iəʔ]，[əʔ]。

合口一、二等[əʔ]，[uəʔ]；三、四等[iəʔ]，[əʔ]，见系出现[yəʔ]。

其中的[iəʔ]更像是[ɪʔ]，不形成对立音位，不作区分。

苏州、上海和昆山的一致。

臻摄的情况类似蟹摄，表面看起来复杂，实际三地无音位差别。

山摄

昆山山摄舒声开口一等各韵韵母是[ø]、[ɛ]；二等[ɛ]；三、四等[i]。

入声开口一等[aʔ]、[əʔ]；二等[aʔ]；三等[ɪʔ]、[əʔ]；四等[ɪʔ]。

舒声合口一等见系[ø]，其他[uø]；二等[uɛ]；三等[i]、[ɛ]、[ø]、[uø]；四等[uø]。

入声合口一等[əʔ]、[uaʔ]、[oʔ]；二等[əʔ]、[uaʔ]；三等[ɪʔ]、[əʔ]、[aʔ]、[yəʔ]；四等[yəʔ]。

苏、沪两地与昆山音位相同；只是苏州在入声合口二等有[uəʔ]，可以视为[uaʔ]的变体。

三地音位一致，音变趋势都高度相似。譬如[ø]、[uø]均开始趋向合并，昆山市区已经几乎不分，全部读成[ø]。又譬如三地[əʔ]、[oʔ]也趋向合并，昆山比较明显，譬如入声开口一等曷韵的"渴"，老派为[oʔ]，中派已经[əʔ]、[oʔ]合并。

有的材料将昆山的[yə]记为[yɵ]，只是符号区别，本文不作区分。

效摄

效摄各韵韵母，昆山和上海一致，一等[ɔ]，四等[iɔ]，二、三等[iɔ]、[ɔ]都有。

---

[11] 有的文献把苏州的[ia]写成[iɑ]，不是对立音位，本文不作区分，昆山的情况也一样。

[12] 昆山的[ø]舌位略高于[ᴇ]，圆唇、偏央，有的材料，譬如吴林娟(2006)就记作[ɵ]，上海也类似，本文不作区分，统一记作[ø]。苏州对应的是[øʏ]，动程很小，听起来和[ø]极相似。

把[o]改成[æ]就是苏州效摄各韵韵母。

陈立中（2004：76）指出，吴方言、湘方言中古效摄字主元音音变轨迹*a＞*ʌ＞*a/ɒ＞*ɔ/ʌ＞*o/ɤ，韵尾*u 脱落。整个吴方言区效摄字主元音以[o]占优势，各地和中古相比主元音呈现后高化的音变。苏州[æ]是很特殊的情况，其周边吴方言区都处在[ʌ]~[o]之间；而昆山、上海都处在很靠后的音变阶段。

果摄

昆山果摄舒声开口韵字的韵母是一等端系[a]/[əʊ]，见系[əʊ]；三等见系[a]。

舒声合口一等[əʊ]；三等见系[io]。

三地一致，唯一区别是上海没有[əʊ]，只有[u]，主要是帮系字音出现。

苏、昆中[u]都出现了裂化为[əʊ]的音变，根据《苏州同音常用字彙》的记载，早先的苏州方言和上海方言一样，也全是[u]，后来才出现的分化（丁邦新，2003）。所以有理由认为，昆山方言也是类似的。在果摄元音裂化这一点上，苏、昆都要"新"于上海。

假摄

昆山假摄各韵韵母只有二、三等韵，舒声开口二等[ʊ]，见系分化为[a]、[ʊ]；三等比较复杂，精组为[ia]，庄组、知章组为[ia]、[ʊ]，日母[a]，见系[ia]。

舒声合口二等只有见系，为[ʊ]。

上海和昆山一致。

苏州比较复杂，主要是文读音多，开口二等中见系有[io]，开口三等中见系、精组都有[i]，庄组、知章组有[i]、[øʏ]；合口二等见系有[əʊ]。

假摄各韵韵母，可以说昆山、上海为一类，互相一致，苏州白读音也和它们一致。不过多出来的文读音音位较多，并且在昆山、上海方言中很难找到，应该是受外部权威方言影响更大。

宕摄

昆山宕摄各韵韵母很有规律，舒声开口一等韵为[an]，三等既有[an]也有[ian]。

舒声合口韵无论一、三等都是既有[an]也有[uan]。

入声开口一等[oʔ]，三等[iaʔ]，合口都是[oʔ]。

苏州宕摄各韵韵母和昆山大体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苏州区分[an]、[ɑn]，庄组配[ɑn]，知章组既有[an]也有[ɑn]，其他都是[an]，不过这两个鼻韵处在合并过程中。

上海也类似苏州区分[an]、[ɑn]。

梗摄

昆山梗摄舒声开口二等韵韵母[an]、[ən]、[in]；三、四等[ən]、[in]。

入声开口二等[əʔ]、[aʔ]；三、四等[ɪʔ]、[əʔ]、[ɑʔ]。

舒声合口二等[uan]、[on]；三、四等[ion]、[iən]。

入声合口二等[aʔ]；三等[ioʔ]。

苏州和昆山一致；上海也大体一致，只是苏、昆的[aʔ][13]，在上海是[ɑʔ]。

另外，昆山入声开口二等[aʔ]，譬如"白"，三等[ɑʔ]，譬如"石"，吴林娟（2006）还分列，实际在当时市区主流已经合并。[on]、[ion]，很多材料都记为[oŋ]、[ioŋ]，北部吴方言前后鼻韵并不对立，前面已经说明，有的人认为后鼻音较重。

总体来说，苏、昆、沪三地的梗摄各韵韵母，前两地一致，上海的和前两地音位一致，音值上稍有差异，即[ɑʔ]替换[aʔ]。

曾摄

昆山曾摄舒声开口一等韵韵母[an]、[ən]；三等[in]、[ən]。

入声开口一等[əʔ]；三等[əʔ]、[ɪʔ]。

舒声合口一等[on]。

入声合口一等[uəʔ]；三等[oʔ]。

[13] 有的材料将苏、昆的[aʔ]记为[ʌʔ]，只是记音习惯不同，本文不作区分。

昆山曾摄入声合口字韵母的[uəʔ]，在市区已经出现[oʔ]的变化，譬如“国”、“或”；[oʔ]也有[yəʔ]的音位变体，譬如“域”。

苏、沪两地曾摄各韵韵母和昆山方言大体一致，稍有不同。苏州的曾摄入声合口一等有[əʔ]；三、四等见系是[yəʔ]，和昆山“域”[oʔ]＞[yəʔ]类似。[əʔ]也可能存在[iəʔ]的音位变体，在实际语音中不是对立音位，其他音位一致。

该摄极个别语音上，苏、昆表现出比上海更“新”一些，譬如上海可以保持[uəʔ]，但是苏、昆都有向[oʔ]音变的趋势；上海“域”等字的[oʔ]可以保持，苏、昆受则受官话（普通话）的影响向[yəʔ]音变。

流摄

昆山流摄开口一等韵韵母全部是[e]；三等[iø]、[e]、[y]。

苏州、上海和昆山对应非常齐整，苏州一等[e]；三等[øʏ]、[e]、[ʏ]。

上海一等[ɤ]，三等[iɤ]、[ɤ]。

从主元音看，苏、昆虽然有[e]和[øʏ]/[y]的差别，但属分化结果。

昆山的[y]是[iø]的音位变体，前者应当是受官话（普通话）影响产生的音变。譬如“秋”、“酒”，部分人韵母全读前者，部分人全读后者，还有人“秋”[ts^hy]、“酒”[tsiø]。其次，昆山市区正在经历[iø]、[ø]合并，本身[iø]很难保持。

苏州的[øʏ]、[ʏ]是类似的关系，市区正在经历[øʏ]、[ʏ]的合并。[e]和[ø]就是圆唇与否的差别，后者反映出中古流摄韵母有*-u 尾；[ʏ]、[y]和[e]是高低的区别，说明“等”的差异。这些都说明[e]和[øʏ]/[y]属于一个来源，苏州市区正在经历[øʏ]＞[e]的音变也说明了这一点。

上海的三等[iɤ]、[ɤ]应该为[iɤ]、[ɤ]、[ɤ]，分别对应昆山的[iø]、[e]、[y]，苏州的[øʏ]、[e]、[ʏ]。如果按照苏、昆的音变轨迹，上海的[ɤ]会分化出两个元音，目前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以上的情况说明，苏、昆、沪三地流摄各韵韵母高度一致，可以认为互为音位变体。从音变进程来看，苏、昆比上海更“新”；如果考虑[e]韵母覆盖的字音的数量，昆山的音变进程比苏州还“新”。

深摄

深摄各韵韵母在三地完全一致，开口三等舒声[in]、[ən]，入声[əʔ]、[ɪʔ]；没有合口，没有其他等。有的材料[ɪʔ]记为[iəʔ]，只是记音习惯不同，不作区分。

咸摄

昆山咸摄舒声开口一等[ɛ]、[ø]；二等[ɛ]；三等[i]、[ø]；四等[i]。

入声开口一等[əʔ]、[aʔ]；二等[aʔ]；三等[ɪʔ]、[əʔ]；四等[ɪʔ]、[aʔ]。

舒声合口三等[ɛ]；入声合口三等[aʔ]。

苏州、上海方言咸摄各韵韵母和昆山一致。有的人认为苏州[ø]和昆、沪[ø]听感上稍有不同，应当记为[ɵ]，本文认为只是记音习惯不同，不作区分。开口二等洽韵中，极个别字譬如“恰”、“洽”，受普通话影响很多人将韵母读成[iaʔ]，但是口语中三地并无此二字；开口二等狎韵中，极个别字譬如“甲”文读时韵母也会读成[iaʔ]，常用字中只有此一例。一般不认为咸摄入声开口二等韵韵母有[iaʔ]。

苏、昆、沪三地咸摄各韵韵母虽然各自内部比较复杂，但是互相之间完全一致。

2. 韵类的“新旧”

从韵母来看，苏、昆可以归为一类，上海为一类。上海的某些韵母表现出比苏、昆“新”的一面，譬如“衣”[ij]、“烟”[i]不分，[ɥ]、[ɿ]合并等。而苏、昆在某些方面比上海“新”，譬如[u]裂化为[əʊ]，[an]、[ɑn]合并等。

（三）调类比较

不同的发音人往往个体差异较大及记录时间不同，不同的文献对于三地声调具体调值的记录差异较大，并非测量和记录错误。本文采用汪平（2011）、吴林娟（2006）、薛才德(2010)记录的三地调值。苏、昆、沪三地声调问题牵涉到连读变调比较复杂，仅以单字调调类而论，苏州 7 调，阳

上并入阳去；昆山 7 调，阳上并入阳去；上海 5 调，阳平、阳上并入阳去，阴上并入阴去。

调类/调值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苏州	44	223	51	并入阳去	523	231	43	23
昆山	44	24	52	并入阳去	412	213	55	23
上海	53	并入阳去	并入阴去	并入阳去	34	23	55	12

北部吴方言如果是 7 调类的，一般都是阳上、阳去合并，昆山、苏州非常相似，就属于这种情况。区别是苏州阴上、阴去还能保持独立地位，但是有的阴去调的字音已经开始并入阴上（钱乃荣，1992：38）。上海的调类变化轨迹与苏、昆不同，部分学者认为是受宁波方言影响的结果；游汝杰(2016)认为是老上海话、苏州话和宁波话杂交的结果。从合并情况看，上海的调类比苏、昆更前进一些。

三、总结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有以下结论：

（一）苏、昆、沪三地方言音类极其相似。

基于常用字音及词汇统计，陆致极(1992：48)的计算得出结果，昆山方言和苏州方言的相关系数值为 0.8996，昆、沪为 0.7682，苏、沪为 0.6985。也就是说，昆山方言和苏州方言最接近，和上海方言稍远，但是比起苏、沪之间，苏、昆之间更相似。从前文对于三地音类的对比来看，三地方言极其相似当无疑议。声母、声调上苏、昆都更接近，只有韵母方面，昆山兼有苏、沪特征。以一般认识来看，可以说昆山方言更像苏州方言，也符合计算结果。

（二）昆山方言听感上更像上海方言的原因。

以经验观察，大部分非三地人士在听感上认为昆山方言更像上海方言，很多昆山居民也持此种观点；附近地区只有上海居民普遍觉得昆山方言偏苏州口音。造成这种认识的可能原因是昆、沪两地在具体音值上更相似，而苏州方言语音尤其是个别前、低元音特色明显。譬如效摄出现[æ]，流摄出现[øʏ]，在附近区域中都属于辨识度极高的特色；但是从音位上来说，和昆山是一致的。

（三）昆山方言的“新旧”问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苏州、上海作为区域中心，语言变化应当更快，受外部权威语言、方言影响也应当更大；以常识推断，昆山方言应该比苏、沪都“旧”，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声母来说，上海最“新”，苏、昆无差别，符合上述推断。而从韵母来说，昆山方言显示出“新”的一面。譬如[u]裂化为[əʊ]，譬如[a]、[ɑ]合并，这些音变都走在上海前面。上海方言的“新”主要表现在新派、新新派受普通话影响产生大量的新文读，在白读和老文读方面，比我们想象的保守。昆山方言的“新”可能跟同时受到苏州、上海两大临近强势方言及官话（普通话）的影响有关。

四、余论

自 1843 年正式开埠以来，上海发展迅速，逐步取代苏州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方言也成为区域内最强势的方言土语。然而，如果将尺度放宽到过去一千年，乃至数千年，苏州方言无疑对周边方言辐射强度最大。行政区划上，古代昆、沪长期属于苏州，昆山更临近苏州核心区域。可能的推断是，历史上昆山方言和苏州方言更“亲”。

当然，本文对于三地语言的对比还比较初级，重点是音类对比。在音素、词汇、句法、语义方面的对比将更能揭示昆山方言的历史演变轨迹，还有待其他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车玉茜.(2008).昆山方言连读变调的处理及与上海、苏州的比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3(9),5.

2．陈立中.(2004).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陈忠敏.(2013).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分析法. 中华书局.
4. 丁邦新.(2002).《苏州同音常用字彙》之文白异读.中国语文(5),9.
5. 丁邦新.(2003).一百年前的苏州方言. 上海教育出版社.
6. 顾钦.(2007).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博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
7. 陆致极.(1992).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 语文出版社.
8. 钱乃荣.(1992).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9. 钱乃荣.(2014).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1847-1950年的上海方言.上海大学出版社.
10. 沈钟伟.语言转换和方言底层.见：丁邦新.(2007).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11. 汪平.(2011).苏州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12. 吴林娟.(2006).昆山方言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13. 薛才德.(2010).上海方言与苏州方言、宁波话的音系比较——兼论方言接触对上海方言的影响. 中国方言学报(1).
14. 游汝杰. (2016). 汉语方言学教程（第二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15. 游汝杰.(2006).上海方言在吴语分区上的地位——兼论上海方言的混合方言性质.方言(1), 7.